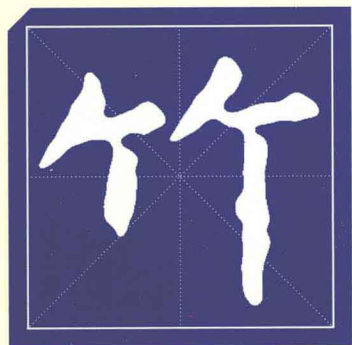


读
史
阅
世



第

一

卷

／

第
一
册

孙
猷
涛
／
主
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第
一
卷
／
第一册

孙猷涛
／
主编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竹书. 第1卷. 第1册 / 孙献涛主编. -- 北京:

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112-5367-5

I. ①竹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通俗读物

IV. ①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6259 号

竹 书 第 一 卷 第 一 册

著 者: 孙献涛 主 编

责任编辑: 杨 娜 朱 然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后声文化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9571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19571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 zhuranmuc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90×975 1/16

字 数: 110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5367-5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发刊词

不准·编年

许多原典都是从土里挖出来的。

西汉武帝时，热衷于对自家宫室拆迁改造的鲁恭王，命人推倒隔壁孔子旧宅的一面墙，一堆蒙尘的儒家经籍倾泄而出。这些躲过了秦汉之际连绵兵燹的古文典籍，引发了此后两千多年的“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”之争。虽然不能把每一次“古今之争”都简化为利益之争，但这些原汁原味的儒家先贤口水书，到了六经证我的经学家手里，无一例外地被改造成了射向论敌的枪弹，本已混乱的价值观，被解读得更加说不清楚。这种借古讽今的政论小把戏，一直演到了康有为那一代，康圣人炮制出一部《新学伪经考》，拐弯抹角地推行源自西方的君主立宪。

类似“鲁壁出书”的原典大发现，四百年后又来了一次。这一次，让依附于经学的史学得以另立门户。西晋太康年间，另一个武帝司马炎当政，一位名为“不准”（FOU BIAO）的盗墓贼，意外打开了位于汲郡（今河南汲县）的战国时期魏襄王大墓。大墓里竹简堆积如山，但不准只对金银珠玉感兴趣；墓室太暗，他便顺手点燃几片竹简照亮。几天后，没烧完的几十车竹简被当时的中央政府发现，司马皇帝组织专家抢救性发掘整理，一部十几万字的编年体史书穿越时空，《竹书纪年》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这部尚未沾染“为尊者讳、为长者讳、为亲者讳”习气的《竹书》，用触目惊心的史实，订正了《史记》对上古史事的曲笔和演绎。史学不同于经学的独立和尊严，长成在竹简所记血淋淋的史事之中。与蒐罗填补秉笔直书

的《竹书》相比，孔夫子别有用心批阅增删的《春秋》，确实是王安石所说的“断烂朝报”。也难怪文丞相要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而非“甘洒热血写春秋”；用“竹书”代指历史，显然比“春秋”更准确一些。

《竹书》是编年体史书的滥觞。“编年体”奉时间为圭臬，在时间面前，任何强权暴政、孤家寡人都何足道哉，悲欢聚散、治乱兴衰都是过眼烟云。

从不准到现在，盗墓贼们从未停止工作，封土和巨石掩盖不了历史真相，再坚固的大墓也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被人揭开盖子。忠实于时间的“竹书”，被越来越多的“不准”扔得满地都是；如果翻拣得仔细，有心人甚至能淘到一些洋玩艺儿。媒体报道，华东师大的沈志华教授花了一百万元人民币，从俄罗斯买来22000页前苏联档案。“前苏联的历史要被重写了”，看过这批档案的中国学者都这么说。摆在你面前的这一本《竹书》，就是想用这些新发现的竹片，做成一部重写的史书。多拼图，少演义，慢功出细活，一期接一期。

当然“重写”不是目的，“纪年”才是关键。

那么，所有的年，所有的旧年和新年都来吧，让我来编织你们。

此为第一卷之第一册。

孙献涛

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

目 录

【时代解读】

最是人间留不住：《寓意草》与其他

北京大学博士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秦燕春 / 1

【本期专题】

西汉“军功集团”的出场与退场

腾讯历史频道主编 谌旭彬 / 17

寒门子弟左思的蹉跎人生

自由学者 傅狮虎 / 27

九品中正制的前世今生

自由学者 何木风 / 33

何怀宏谈“选举”

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何怀宏 / 40

【史海寻踪】

太上皇的退休生活

上海书评主编 张明扬 / 44

战后国民政府反腐第一案

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 阮清华 / 68

【专栏】

神兵天降、鬼兵地生

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教授 朱建军 / 81

千般声色，万象归春

——《中国笑话史》连载之一

中国社科院古代文学所退休研究员 王学泰 / 89

【书林漫话】

一个老狐狸的肺腑之言

——读《论中国》

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曹东勃 / 101

萨维尼从巴黎来的信

北京大学法律史博士，经济学博士后 林海 / 109

最是人间留不住：《寓意草》与其他

秦燕春

一、正名：观·人间

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

这是王国维《蝶恋花》中的句子，创作于1905年，观堂住在海宁，也许此前屡屡谋教席于外（先是在南通师范学堂，而后在江苏师范学堂）的生活奔波，让生性对情敏感的王国维有所触动。全词如下：

阅尽天涯离别苦，不道归来，零落花如许。花底相看无一语，绿窗春与天俱暮。待把相思灯下诉，一缕新欢，旧恨千千缕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

这句话因此美得让人心碎。过去四年，每逢6月2日我必讲“观堂之死”。最喜欢从“人间”与“观堂”的名号变化切入王国维青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。

之前并无细思王国维何以“人间为号”。罗振常（振玉弟）在《人间词甲稿序》“又记”中曾言：

时人间方究哲学，静观人间哀乐，感慨系之，而甲稿词中“人间”字凡十余见，故以名其词云。

所以王国维在“静安文集”时代的作品集，系列命名有《人间词》、《人间词话》、《人间诗集》（罗振常代改）。

如上这段话其实又将王国维另外一个闻名遐迩的“号”来源亦点明：观堂之“观”何谓也。众所周知，王国维生平所用号至少还有初号礼堂，又号永观，晚号观堂。王国维夫子自道所谓“诗人对于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；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”（《人间词话》）。

静观人间，或许正是王国维对自己现世人生的期许，无论他是否做到。刻骨一点讲，1927年6月2日鱼藻轩前奋身一跃，倒也未必不是王国维意义上的“静观”，却无法静安。

《人间词》绝对数量不算多，大约115首，“人间”二字却出现了至少39次。略举其数例如下：

遣愁何计频商略？恨今宵，书城空拥，愁城难落。陋室风多青灯地，中有千秋魂魄，似诉尽人间纷浊。七尺微躯百年里，那能消，今古闲哀乐？与蝴蝶，遽然觉。（《贺新郎》，1903）

金城路，多少人间行役？当年风度曾识，北征司马今头白，唯有攀条沾臆。都狼藉。君不见，舞衣寸寸填沟洫。细腰谁惜？算只有多情，昏鸦点点，攒向断枝立。（《摸鱼儿》“秋柳”，1905）

昨夜梦中多少恨，细马香车，两两行相近。对面似怜人瘦损，众中不惜褰帷问。陌上轻雷听渐隐，梦里难从，觉后哪堪讯？蜡泪窗前堆一寸，人间只有相思分！（《蝶恋花》）

曾识卢家玳瑁梁，觅巢新燕屡回翔，不堪重问郁金堂。今雨相看非旧雨，故乡罕乐况他乡。人间何地著疏狂。（《浣溪沙》，北京，1906）

山川城郭都非故，恩怨须臾误。人间孤愤最难平，消得几回潮落又潮

生。（《虞美人》，1907）

北征车辙，南征归梦，知是调停无计。人间事事不堪凭，但除却“无凭”二字。（《鹊桥仙》）

人间总是堪疑处，唯有兹疑不可疑。（《鹧鸪天》）

换尽天涯芳草色，陌上深深，依旧年时辙。自是浮生无可说，人间第一耽离别。（《蝶恋花》）

人寂寂，夜厌厌，北窗情味似枯禅。不缘此夜金闺梦，那信人间尚少年。（《鹧鸪天》）

“人间纷浊”也罢、“人间行役”也好，抑或更为著名的句子犹如“人间只有相思分”、“人间事事不堪凭”、“人间总是堪疑处”……“人间”风物在观堂眼中笔下，无疑哀多乐少，满目皆是“人间哪信有华颜”、“人间几度生华岁”、“人间何苦又悲秋”、“人间第一耽离别”……“人间解与春游冶”这种欢娱，难得一见。

原因太多。王国维身后也已经被释读得层出不穷近乎乏味，最后总要归结到“观堂之死”，他的老病穷愁，诗意与学问、谋食与谋世，都不足以挽留王国维不做那奋身一跃。

观堂的身体不好很显然。文如其人还是有道理。衡文颇称毒辣的钱钟书先生道其“少作时时流露西学意谛，庶几水中之盐味，而非眼里之金屑。其《观堂丙午以前诗》一小册，甚有诗情作意，惜笔弱词靡，不免王仲宣‘文秀质羸’之讥”，更像一种体质诗学。“水声粗悍如骄将，天色凄凉似病夫。江上痴云犹易散，胸中妄念苦难除。”（《五月十五夜雨赋此》，1903）这类句子出自壮岁青年（观堂生于1877年），可见一斑。更有痛心疾首者，“苦觉秋风欺病骨，不堪宵梦续尘劳。至今呵壁天无语，终古埋忧地不牢”（《尘劳》，1903年秋），身苦心苦，一目了然。

后人每每乐道王国维才大气粗、为学不世出，干一行像一行，诸如《红楼梦评论》、《人间词话》、《宋元戏曲史》，无论早年对康德、叔本华的吸收，还是中年变法“尽弃前学，专治经史”（罗振玉《观堂集林序》），

尤其一头扎入殷周文字古史研究后所取得的灼灼业绩，但我相信他的成就来自他的“较真”。王国维笔下从无娱乐人生的时分，他刻刻为着内心真实的苦痛寻找答案而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，观堂是天生的哲人，这是后世轻易讥他“殉清”的末法文人无法懂得的。

俞大维先生《怀念陈寅恪先生》一文，曾提及陈先生对于“中国历代兴亡帝原因，中国与边疆民族帝关系，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，社会风俗，国计民生，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，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，原因何在？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”，但“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，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，他很少提及。……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。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，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”。我本人以为这点气质上的差异足够决定王、陈二先生对于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（陈撰《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》）的理解可以天壤之别，虽然也可以各有千秋。

恋恋而又试图“静观”人间的观堂先生，对于生死的体悟，有常人不能及者。一个人如何病以及如何死，经常就是时代气质的集中体现。

二、死生，《寓意草》

不能仅仅把疾病当作隐喻。但疾病往往恰能担当一个时代世风与人性的象征意义——设若我们接受“共业”这一佛教观点，则一个时代流行之病当然就是那个时代气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例如据说肺结核作为“诗人的疾病”曾经风靡整个19世纪：现实的例子有济慈，幻象的例子有拜伦。在中国无独有偶的，该是动辄就咳喘作一团的大观园中的女诗人林黛玉。爱哭本身就是肺不好的表现，或说肺不好才爱哭呢，二者互为表里。

清代中叶吴门名医徐大椿（灵胎，1693—1771）《医学源流论》中专门有《病随国运论》，探讨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两个特殊时期，时局朝纲与病情医理的亲密关系：

上古无论，即以近代言，如宋之末造，中原失陷，主弱臣驰，张洁古、李东垣辈立方，皆以补中宫，健脾胃，用刚燥扶阳之药为主，《局方》亦然。至于明季，主暗臣专，膏泽不下于民，故丹溪以下诸医，皆以补阴益下为主。

徐氏笔下的“至我本朝”，即回到他身处的“盛清”，则是“运当极隆之会，圣圣相承，大权独揽，朝纲整肃，惠泽旁流，此阳盛于上之明征也。又冠饰簪缨，口燔烟草，五行惟火独旺，故其为病，皆属盛阳上越之症”，据说确有云间老医因此而“专以（黄）芩、（黄）连、知（母）、（黄）柏，挽回误投温补之人，应手奇效”。

这是痛定不痛之后清代顺民的说法。然若上溯“明季”的亲历者、当事人，仿佛彼时一朝药运又非单纯“补阴益下”一脉可囊括之。明末清初的江西名医喻嘉言，在其名著《寓意草》中，专意写到《论士大夫喜服种子壮阳热药之误》这一晚明怪现状，同样慨然论及世风与疾病之间根本毋庸置疑的联系：

盖今者雍熙之象，变为繁促。世运已从火化，复以躁急之药济之，何不丧亡接踵乎！此道惟岐黄言之甚悉，但仕宦家不肯细心究讨耳。其云：凡阴阳之道，阳密乃固，两者不和，如春无秋，如冬无夏，是故因而同之，是谓圣度。

“世运已从火化”一句，语源中医学“五运六气”理论，讲究的是阴阳五行、天干地支、十天干化运、十二地支化气等具体规律的应用。天道地气循环往复、周而复始，人生天地中，人即受制于天地，又影响着天地，例如这助纣为虐的“种子热药”流行于世，对晚明政局能说没有影响？

古时医生对于患者的隐私权问题似乎没有那么敏感。喻嘉言这则医案中明白记载了“娄东天如先生”亦好此道。若无意外，斯人当即当时与后世均大名卓著的复社首领张溥张天如，按此医案，则张氏后来以伤风小恙

竟至于不起，根本原因也在他素日喜欢服用“种子热药”，经年累月如此，导致虚火劫夺其阴、热极生风、酿成大患。

晚明朝野上下的乱局不必多言。秦淮佳丽与青楼随想至今都是国人耿耿于怀的“浪漫”。活生生见到此等记录在案的士大夫胡来的“病例”，老实话，很刺激。抑或“主暗臣专，膏泽不下于民”的局面，也是“热药”后遗症之一种，设若举国上下士大夫均好此道，声名遐迩于后此汗青的“文人结社”，竟而由一群狂服壮阳药的非正常男人组建——明朝不亡，天理难容；中国不亡，天理难容！

喻嘉言名昌，大约生于1585年，歿于1664年之后，甚或有人说他歿于1683年，但无论如何他的离世都是清朝建基（1644）至少二十年后事，关于他的生死之谜甚至学问根基、医学理论，难免如同著名的遗民傅山傅青主，带上同样浓郁的“世风与人性的象征意义”，尤其明朝覆亡的伤痛记忆。

喻嘉言被称为“清初三大名医”之一（另外两位为吴谦、张璐），一如那个时代读书人应该有的科举出身，他中过小小的副榜贡生，却也曾以此身份“入都上书言事”——那个时代特有的文人燥烈，他同样也有过。阎若璩《潜剑记》“与戴唐器书”中，将他与钱谦益、黄宗羲（“明末三大家”之一）、吕晚村（他则成为雍正年间文字狱的重要人物）、魏叔子（禧，著名江右遗民）等人相提并论，可见其生前名流声望之重。但他医术精湛应该并非浪得虚名，所谓“治疗多奇中，户外之履常满”（《靖安县志》）。又因为暮年深感“执方以疗人，功在一时；著书以教人，功在万里”，他名下的传世之作至少还有《尚论篇》、《尚论后篇》、《医门法律》等累累如珠。也许他那些貌似多余的文名、才名，只能证明“传统名医”——无论中西——西方的传统名医例如盖伦（Galen），同样更是思想家、哲学家——的修养底蕴与知识结构如何不同于今时着重于修理肉身、还未必修得好的白衣天使。但这不是医生自己的错。在这样的专家时代，跨专业门诊在许多大型医院被明令禁止，这本身就是世风与人性的一部分。

喻嘉言亦曾短暂出家为僧，但后来他又还俗，据说“自儒而禅，自禅

而医”，不知是否与明清异代之际大夫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之后纷纷“逃禅”有关系。有些传闻说他“本姓朱，明之宗室”（《牧斋遗事》）则未免就是“晚明想象”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添油加醋，当不得真。明朝覆亡之后喻嘉言经常侨居常熟，与两朝斯文领袖风月总舵钱谦益（牧斋）甚为相熟，他后来即卒于钱家，同样信好佛法的钱谦益“以坐化龛奉之”、以僧礼殓之。

喻嘉言身后没有子嗣，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缔姻，或者如同顾炎武那样，以“死不还乡”（喻是新建人）乃至拒绝生育的形式，以“家亡”来纪念他的“国破”。他有个姐姐嫁在靖安，于是遗骨后来被外甥迎回该地。因为医名大震，清代中叶逐渐流行表彰明遗民之后，江西的医士追认他是“明处士，隐于医”，又将其迁葬在南昌徐孺子墓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喻嘉言这部《寓意草》的首次刻板付梓恰在明亡前一年，即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，对于这样一位身份、学养、经历都显得极为特殊的名医，此举显得绝非无意之举：他或许曾经试图用医风提醒、警告、甚至挽救世风。

“种子热药”在晚明的盛行，该是一时流风。《寓意草》中至少还以如下医案的形式又暗示了此中情形：“是病枝叶未有害，本实先拔，必得之醉而使内也”（《论金道宾真阳上脱之症》）、“犯房劳”（《辨黄长人伤寒疑难危症治验并详海门人》）、“袁继明素有房劳内伤”（《论内伤转疟宜防虚脱并治验》）、“好色作劳，气不归元，腾空而上”（《面论李继江痰病奇症》），等等。这些人并非都是“士大夫”之属，例如最后这位李继江，乃是“白手致素封”、收租乡里为业，大概是位有钱的地主。

饶是喻嘉言本人，在在反省晚明医风“燥急”，然就《寓意草》本身呼天抢地并不那么迂徐从容的风格言之——这在此后吴鞠通或陈修园医案中，却不大容易看到。饶是清代中叶那位吴门徐大椿，极擅杀伐斩断能出奇兵的医门圣手，却仍有一种时过境迁而能置身事外的清冷。因此他也不满意方有执和喻嘉言的著述，所谓“至近代前《条辨》、《尚论篇》等书，又复颠倒错乱，各逞意见，互相辩驳，总由分症不清，欲其强合，所以日就支离”（《〈活人书〉论》）。

喻嘉言的热烈乃至激烈，带着时代印痕，他同样是晚明管弦“繁促”特有的文化产物。

在《先议病后用药》中，喻嘉言流露出孟子般的迫切，“吾其好辩哉？吾不得以也”：

故昌之议病，非得已也。昔人登坛指顾，后效不爽前言；聚米如山，先事已饶硕画。医虽小道，何独不然？昌即不能变俗，实欲借此榜样，阐发病机，其能用不能用何计焉？

喻嘉言论伤寒学喜好方有执“错简”一派，即显出心学“疑古”的鲜明时代倾向。他也是自负的，例如在《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验并详海门人》中，如此告诫弟子：

子辈既游吾门，日引光明胜义，洗濯肺肠，忽然灵悟顿开，便与饮上池无二。若但于言下索解，则不能尽传者多矣。

这是个性情中人，《直叙王岵翁公祖病中垂危复安始末》，他文末留下金圣叹般的天真喜悦，“祖翁病剧，问昌何以不至，及病间，见昌进药，即鼓勇欣尝，抑何见知之深耶！而昌亦得借汤药以行菽水之事，快矣快矣”。《详论赵三公令室伤寒危症始末并传海门人》讨伐庸医误人时又不禁形动于色，“天之所弃圣君贤女，抑何惨耶！余非乏才具者，而袖手旁观，不禁言之亲切，有如子规之啼血也已”。尤其《论治伤寒药中宜用人参之法以解世俗之惑》，文中他知人论世、论世以药到了不分彼我的程度：

汗、和药中兼用人参，从古至今，不曾伤人性命，安得视为砒鸩刀刃，固执不用耶！最可恨者，十百种药中，独归罪人参君主之药，世道人心，日趋于疾视长上，其酝酿皆始于此。昌安敢与乱同事，而不一亟辨之乎！

联想一下晚明时局，那位自苦自厉却也刚愎自用的在位君主崇祯皇帝，君臣关系，文武关系，朝野关系……这样的医案，或许真是晚明特有的医案。空前绝后的医案。

抑或晚明社会气质上的躁动，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吃错药。

那么一个盛行癌症的时代，她的气质又该如何？

三、吾我：思癌症

据说现在，全球尤其中国，我们不幸遭遇了癌症，她是“众病之王，恐怖之君”。

具体而骇人的数字很多可以列举，例如全球每年约 800 万人死于癌症。中国每分钟有 6 人被确诊癌症，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 312 万、死亡癌症病例约 270 万，等等。

这是真实的。我母校北京大学的附属肿瘤医院里面人山人海。第一次走近那个所在的时候我心中充满哀矜，说不清是对病人还是对医生、对他人还是对自己。因事来往成习之后，竟而生出了诡异的释然——如此“人气”似乎令一种“绝症”带上几分嘉年华般的末日狂欢。这种感觉并非因为冷漠——更多，是一种无奈！

于是有人说，“癌症”在这个时代，该说是种常见病、慢性病了。说不清这语气里包含的是对医疗进步的信任，还是对恶疾缠身的自慰。

也许如下判断并非基于一种浪漫措辞：癌症在当下的爆发性出现，固然有环境污染等现代社会因素促成，以及基于人类整体寿命的延长使得“死于癌症”而非死于其他已经控制的可怕疾病例如曾经的霍乱、鼠疫成为可能，另外有个诠释理由却更加不容忽视——是人类认知能力尤其微细胞学的发展，使得因此被界定的这种疾病被“生产”出来。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，她一直都“在”，隐性的在，隐身的在。只是这个时代轮到她粉墨登场、肆虐挥洒。诚如 C. E. Rosenberg 所言，“疾病，从某些角度来讲，只有我们感知了它、命名了它，并对它做出了反应”——它才“存在”。

这里说的，其实是作为名相的“疾病”获得“存在”于我们的意识之中。

众多的癌症类型，也总有特定的类型在一个时代脱颖而出。前几时因为那位多事的好莱坞小角色——都说她是性感明星，可她显然除了绯闻没有贡献给银幕任何有分量的工作，朱莉为了预防乳腺癌，提前切除了她的双侧乳房并造了两个假货。

据说这条消息让很多女性大为紧张，也足以让乳腺癌成为当下众癌中的王后、一种流行的癌症、时髦的癌症。

任何疾病同时都是情志之病，中西传统医学都公认的病因基点当然正确。以乳腺疾病为例，《格致余论·乳硬论》所云：“若夫不得于夫，不得于舅姑，忧怒郁闷，昕夕积累，脾气消阻，肝气横逆，遂成隐核，如大棋子，不痛不痒，数十年后方为疮陷，名曰奶岩，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。”这个劳什子在传统中国，常见的名称是“乳岩”。东晋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卷五称其为“(乳)石痈”。南宋陈自明在所著《妇人大全良方》中首次提出“乳岩”之名，后世多沿用此说。真正用“癌”字称恶性肿瘤见之文献者，当首推公元1264年杨士瀛所著《仁斋直指方论》。该书卷二十二云：“癌者，上高下深，岩穴之状，颗颗累垂，裂如瞽眼，其中带青，由是簇头，各露一舌，毒根深藏，穿孔通里，男子多发于腹，女子多发于乳”——这些厚厚的宗卷证明，“乳腺癌”在当时已经是常见病。只是限于当时早期诊断的能力，进入临床观照时恐怕多已是症候明显的晚期，因此多不治，但中国文化哺育出的医疗思想仍然会努力赋予许多“尽人力以待天命”的辅助疗法：

乳岩属肝脾二脏郁怒，气血亏损，故初起小核，结于乳内，肉色如故，其人内热夜热，五心发热，肢体倦瘦，月经不调，用加味归脾汤、加味逍遥散、神效瓜蒌散，多自消散。若荏苒日月渐大，乳岩色赤，出水腐溃深洞，用前归脾汤等药，可延岁月，若误用攻伐，危殆迫矣。大凡乳症，若因恚怒，宜疏肝清热。痛寒热，宜发表散邪。肿痛甚，宜清肝消毒，并隔蒜灸。不作脓，或脓不溃，补气血为主。不收敛，或脓稀，补脾胃为主。